

中国未婚青年 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

——一种代价论视角的分析

郭 未 郑晓璜 吴 正

提要:由于缺乏全国代表性数据,迄今我们对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这一重要生命历程事件仍然缺乏了解。2009年第一次全国青年生殖健康调查捕捉了全国超过22000名未婚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相关信息,本文使用这一数据,用乘积一极限法来估计性别视角下的中国青年在城乡与区域层面上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同时采用COX回归模型(考虑设计效应[DEEF])来探究社会代价和性知识获取层级变量作用于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的差异。结果显示,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有显著的性别、城乡和区域差异,并且社会代价层级的变量对于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的影响非常明显,这包括性别、城乡、区域与家庭结构;而性知识获取层级的变量除个人受教育程度外对其影响则不甚明显。研究结果提示,在设计防范青年风险性行为发生的干预政策时,应注重社会代价理论的视角,同时关注那些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最少的风险群体并考虑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的性别差异。

关键词:首次性行为 风险因素 代价论

一、引 言

在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加速提前(Caron & Moskey, 2002)。这种首次性行为年龄愈渐降低的现象,与这些国家的“性文化革命”,以及相应的对于“婚前性行为”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部地区青年人口风险性行为发生机制及干预措施研究——基于健康风险行为关联性的视角”(项目批准号:13YJC840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双年项目“未婚流动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利用的支持环境优先改善策略研究(2012-2013)”资助。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作者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陈建伟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罗朝明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渐宽容的态度是相辅相成的。青年人群中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的早晚,是判断青年人是否暴露于性传播疾病及其他相关疾病的一个重要社会学指标(Hawes et al., 2010; Lohman & Billings, 2008),青年人群中性活动的广泛增加使得学者们对于探究与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相关联的风险因素兴趣盎然,实证研究成果丰富(Bingham et al., 1990; Johnson & Tyler, 2007)。

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已达成一个共识: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开始是重要的生命历程转变,这种转变具有其个人层面的社会意义(Gagnon, 1975; Neugarten et al., 1965)。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时间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这个群体暴露于诸多潜在健康风险的不良结果的开端,比如性传播疾病、未婚妊娠乃至未婚人工流产等(Abma & Sonenstein, 2001; Miller et al., 1997)。实际上,较早开始性行为的青年不但会面临前述风险暴露的问题,更由于他们不采取合适的安全性行为措施(比如使用避孕套),必然使得其中的女性青年会成为未婚妊娠乃至未婚人工流产不良结果的承担者(Abma & Sonenstein, 2001; Resnick & Blum, 1994)。

由此而言,测量一定社会理论视角下的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发生的风险因素等是并将一直是青年健康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Brewster & Grady, 1993)。因此也可以看出,探究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在社会人口学意义上的差异,对细分从事危险性行为的风险群体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今中国,有约1.78亿15岁到24岁的未婚青年人群,^①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性行为发生模式却知之甚少。有质性研究以及一些基于区域样本和临床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青年,其首次性行为年龄都开始提前。随着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青年人口中风险性行为随之增加的现实问题,包括由此带来的未婚妊娠、未婚人工流产的增加和性病乃至艾滋病的传播等公共健康问题(Song & Ji, 2010)。由此,关注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年龄也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在一定的社会理论框架内,采用相应计量分析方法探究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及其风险因素的差异特征。

^①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二、研究概观及理论框架

(一) 青年早期性行为的研究概观

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是青年中诸多随年龄而变的行为结果之一,其评介的正确性依赖于对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语境及社会环境的综合考虑(Lauritsen, 1994; Luker, 1997)。他们性之初始的模式也可为一些关键的(如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状态的)社会人口变量所区分(Furstenberg et al. 1987; Santelli et al., 2000; Upchurch et al., 1999)。此外,首次性行为时间也是一个社会化的结果,它也是基于青年之同辈群体的行为模式的一个内在化过程(Kahn & Anderson, 1992; Nathanson, 1991)。概而论之,青年性行为的发生时间深受其生活的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正是由于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有着异常丰富的层面划分,也就给不同的学者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

从生理学的视角来看,研究人员认为青春期增加的雄性荷尔蒙水平增加了青年男性的性动机,而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们在较早的年龄开始性行为(Billy & Udry, 1985; Zabin & Hayward, 1992)。也有学者基于美国的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Add Health)数据发现,美国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存在季节性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和他/她们随季节而变的生理特征有关的(Levin et al., 2002)。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学者们按照经济学理论定义家庭的首要功能,即供给其成员、尤其是孩子经济和人力资本的获取,因而更多关注家庭对青少年首次性行为时间的影响(Becker, 1975)。以家庭财富或收入为表现形式的财务资本(financial capital)代表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能力。财务资本能改变家庭中孩子的财务负担,也提升影响个体成就的家庭环境(Becker & Tomes, 1986)。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表现形式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则代表了财务以外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能提升家庭环境并能促进和加剧孩子的学习进程。简而言之,财务与人力资本代表了与家庭资源基础相关的基本的束缚与机会(Teachman et al., 1996)。而家庭中亲生父母是否健全与孩子可及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相关联的(Becker, 1975; Cornell, 1990)。上述的社会经济资源反过来与青年的性行为相关联,进一步影响到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发生时间。

还有很多学者从性知识获取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丹麦学者一项针对在校青年的研究表明,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和他/她们是否了解衣原体是性传播疾病最常见的方式具有强相关性(Lauszus et al., 2012)。在中国,我们知道,虽然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于性本身及婚外性行为的保守态度已有所松弛,但是社会中对于公开讨论性话题还是有很大忌讳,而对青年人群更是如此,这也导致青年,尤其是未婚青年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太过粗糙和浅薄(Wang & Davidson, 2006; Wang et al., 2005)。

(二)青年早期性行为的“社会代价理论”建构

性行为不单是受人们的生物属性和生理因素决定的行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性行为的发生还受到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具体到青年的早期性行为的发生来说,我们当然可以从性冲动和遗传基因等生理因素的角度来对这些行为进行解释,但是,生物学模型无法解释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家庭背景中存在的青年早期性行为差异。要对这些差异进行解释,我们就需要求助于社会学或人口统计学。但是,当我们转向社会学和人口统计学时,我们会发现,已有的研究多强调早期性行为的发生是由于青年对性和生殖健康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这种观点暗含着一种“家长作风”(paternalism),即认为青年的心智尚不成熟,缺乏应有的自律,并且他们的选择充满了无知(Fornäs & Bolin, 1995)。本文的出发点与此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青年的行为原则不同于成年人的行为原则;我们进一步认为,青年的早期性行为的发生不仅不是出于无知,恰恰相反,这是个人根据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对“社会代价”进行权衡之后所做出的策略性行动。下面,我们就来具体阐明本文中使用的理论框架。

在大多数国家,青年早期性行为或者婚前性行为都被认为是“越轨”(deviance),也就是说,“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体系中”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或行为”(考克汉姆,2011:110)。社会学中有很多理论对越轨行为进行了解释,在实证主义范式下,有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structural strain theory)和萨瑟兰的差异性联合理论(theory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则有贝克尔的“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戈夫曼的“污名化理论”(stigmatizing theory)等等。

这些理论看待越轨行为的视角各有侧重,但无疑都强调社会规范在界定越轨行为时的根本作用。社会规范就是为某一群体或社会中的成员所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则,它界定了在该群体或社会中,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以及什么是应该受到奖赏的,什么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此,“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的遵从一般会受到群体认可和群体赞许的奖赏……违反规范可能导致对行为的不认可、惩罚,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制裁,这些都会落到冒犯者的身上”(考克汉姆,2011:110)。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规范必然涉及到两种社会后果,一种社会后果我们称之为“社会声誉”,另一种社会后果我们称之为“社会代价”。我们为了分析方便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实际上,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两种社会后果看作是分析链条上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也就是说,违反社会规范导致社会声誉的受损,而声誉受损即意味着付出社会代价。

在传统的越轨理论中,越轨行为往往被定义为一种被动的行为,而越轨者也往往被赋予一种社会弱者的形象。在这里,我们提出,越轨行为是人们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青年早期性行为的发生,是他/她们对自己的越轨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代价进行权衡之后的一种主动的、理性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早期性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代价较低,则易发生;如果带来的社会代价较高,则不易发生。

关于这一理论框架,还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在社会学近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不再直接从社会规范出发来建立模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很难在社会中发现帕森斯所说的那种一致同意的、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Goldthorpe,2007:185-186)。由此,社会规范的解释力就受到了质疑。我们于此提出的理论框架虽然是从社会规范出发的,但是根据实践观点,我们在理论中强调的是行动者的施为能力(agency),也就是说,我们把社会规范作为“工具箱”(tool kit),它包含着行动者的行动策略的全部“剧目”(repertoire)(休厄尔,2012:154;Swidler,1984)。因此,社会规范对行动者来说不只意味着限制作用,而且也意味着使动作用,行动者是在主动地上演脚本,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权衡”的意义之所在。第二,我们的理论框架中的“代价”概念,可能让人们马上联想到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但我们使用的社会代价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其

最极端的形式中,理性选择理论虽然也强调成本(代价)—收益的权衡,但是它明确否定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作用(Becker, 1976)。而我们的理论框架则是根据社会规范来界定行为的准则。不过,正如戈德索普所指出的,也许我们很难严格地把理性行动和遵守规范的行为区分开来,因为遵守规范的行动可以被看成是从制裁的角度对成本收益进行评估(Goldthorpe, 1998; Coleman, 1990)。

(三)影响青年性行为的因素及其变量识别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研究青年早期性行为发生时间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国内学者多以性知识匮乏作为导致早期性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本文将其作为重要的参照点,将其与我们提出的社会代价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下面将具体讨论有哪些变量分别影响了社会代价和性知识的获取。

1. 影响社会代价的变量

(1)性别。性别是最稳健的反映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的预测变量(Hendriksen, 2008)。性别不但反映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而且也承载其社会角色、社会关系,包括个体性生活模式上的差异(Degaston et al., 1996)。通过考察全球诸多学者的学术研究和相关政策研究机构的报告,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地区男性和女性有着相似的性行为模式,而有一些国家/地区在性行为模式和发生时间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性别差异(Bozon & Kontula, 1997; Antonella et al., 2007)。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研究发现,相比于女孩,男孩在较早的年龄开始他们的首次性行为(Lauritsen, 1994; Singh et al., 2000)。从社会进程化的视角来说,研究人员认为,在性行为这个问题上各社会普遍赋予了女性保守的传统观念,因为女性需要承担过早开始性行为导致的诸多负面结果,比如社会排斥、未婚妊娠乃至未婚人工流产,等等(Lauritsen, 1994)。就中国而言,中国社会一直强调女孩处子之身对婚姻的重要性,而且长久以来的性革命都是男性导向的(Pan, 2006; Zha & Geng, 1992)。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男性和女性早期发生性行为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代价是不同的,他们性行为的发生时间相应也会受到影响。本研究探索的是男女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差异的层面,将进一步在计量上以性别为分类变量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分别进行分析,以考察性别之外的其他变量对男女首次性行为发生影响的差异。

(2)城乡与区域。长期以来,国外很多研究关注较大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对于青年性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承载不同社会与经济环境的社区结构与组成会影响到青年的性行为,使不同环境中的青年在性行为发生上产生差异(Hogan & Kitagawa, 1985; Upchurch et al., 1999)。中国不同于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衡量上述的社会经济语境差异,最好的测量变量就是城乡和东中西三大区域,^①即城市与农村,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它们承载着差异化的社会文化属性。

相比于农村地区、欠发达的中部或西部地区,城市和发达的东部地区是社会变革(比如“性革命”)首先发生和持续发展的地方(Guo et al., 2012)。这些地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青年较早发生首次性行为带来的“社会声誉”受损以及造成的社会代价较小,因而这些区域的青年将更可能在较早年龄发生首次性行为。实际上,一些研究已有了初步的矛盾性的结果,比如,有研究指出,在农村或西部这样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婚前性行为比较少是因为这些地区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女孩发生婚前性行为,那么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将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Zhou, 1989),即由于“社会声誉”受损而造成其付出的社会代价较大。但也有学者对此结果存有质疑(Wang & Davidson, 2006)。虽然关于中国青年性行为的城乡、区域差异的研究很少,我们暂时无法借助前人的实证结果来明确说明城乡和区域这两个变量如何影响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发生,但如前所述,这两个变量很显然是潜在的影响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的代价权衡因素。

(3)家庭结构。相对于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青年,未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青年发生性行为的风险更高。对他们而言,较早发生性行为在家庭中受到的责怪相对较小,而且相比亲生父母健全家庭的孩子,其较早发生性行为对家庭声誉的损害也相对较小,因而他们较早发生性行为的社会代价也较小。西方的诸多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住家庭资源这个变量,来自不完整家庭的青年人也更倾向于较早开始性行为(Brewster, 1994; Hogan & Kitagawa, 1985)。另外,单身母亲可能会影响到女儿发生婚前怀孕的风险,因为来自这些家庭的女孩有可能

^① 国家统计局2003年将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从整体上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

更自由地与异性约会,对于性的态度也更宽松(McLanahan & Casper, 1995)。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离婚并不是太普遍,关于离婚对家中孩子行为(包括性行为)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并不丰富,但少量的研究也表明存在负面结果(Xu et al., 2008)。劳伦斯·吴对于美国青年性行为的研究发现,家庭不稳定增加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风险(Wu & Martinson, 1993)。宋逸和季成叶针对中国青年性行为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中,来自亲生父母健全家庭的青年比来自其他家庭的青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更小(Song & Ji, 2010)。

(4)是否在校生。对于15-24岁年龄段的青年而言,区别其身份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划分办法,即是否是在校生。虽然,从目前的文献来看,针对青年性行为的研究缺乏对于青年学生与非学生群体之差异的探索。不过,根据社会代价理论的逻辑可以推知,在中国语境之下,相对于非在校生而言,在校生需要遵从更多的社会规范,比如来自教育管理部门与校方的关于学生行为约束的规定。学生发生婚前性行为无疑是一种越轨行为,一旦发生,他们就必然打破校方和学生身份被赋予的约束性行为的规范,也就必然会使其在所学习生活的圈子内社会声誉受损,进而付出较高的社会代价。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本研究中将“是否在校生”作为重要的社会代价层级的变量纳入计量分析。

2. 影响性知识获取的变量

(1)个人受教育程度。实际上,青年的教育程度与其首次性行为时间的关系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比如,有研究表明个人受教育程度是青年从事安全性行为的最稳定的决定因素,较高教育程度的青年比教育程度低的青年更晚开始首次性行为(Crockett et al., 1996; Juarez & Martin, 2006)。在中国,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比教育程度低的青年拥有更多的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他们了解较早发生性行为所带来的风险(Wang et al., 2005)。因此可以认定,从性及生殖健康知识获取的角度而言,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应晚于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

(2)父母受教育程度。从青年社会化的角度来讲,父母是影响青年形成对性的感知和期待的一个重要因素。孩子通过父母学习对于性的态度,并会在某种程度上履行父母角色参照(presence of parental role models),即以他们的父母的行为为自己的典范(Crockett et al., 1996;

Moore & Rosenthal, 1992; Thomson et al., 1992)。如此,孩子们关于婚前性行为和其他生育相关行为的文化信息获取就依赖于他们的家庭组成和家庭文化本身。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文献均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即以父母教育程度的测量来指代的文化资本对于青年人的性行为有显著影响(Rodgers, 1999; Wu & Martinson, 1993)。较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影响到其子女的文化资本获取,其中当然包括性知识的获取。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研究都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尤其是母亲教育程度高)有利于延迟青年的首次性行为时间(Song & Ji, 2010; Meschke et al., 2000)。

(3)独生子女。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一词若纳入国际视野,可类比于西方学者们常采用的兄弟姐妹(siblings)这个变量。西方的研究发现,家庭中兄弟姐妹的存在,尤其是彼此之间的互动在青年的性行为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East, 1996)。基于我们的研究数据,我们可以用“独生子女”来构造这个变量。西方有学者利用区域样本访谈数据中的受访青年(平均年龄15.1岁)、其兄长或姐姐(平均年龄17.3岁)以及其父母的信息发现,家庭中“有兄长”对于青年的性行为发生时间有显著影响(Widmer, 1997)。而另一调查数据(平均年龄17.7岁)的研究发现,与兄弟姐妹进行过性话题交流的青年发生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小(Kowal & Blinn-Pike, 2004)。总之,学者们有一个共识:家庭中兄弟姐妹的存在,尤其是兄妹之间关于性话题的交流对于延缓青年婚前性行为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青年首次性行为而言,具有同伴群体性知识交流和借鉴的重要意义。

(4)性教育课程。西方有研究表明,针对青年的综合的性教育课程降低了他们较早年龄开始性行为和造成过早怀孕的风险(Kohler et al., 2008)。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单一的禁欲教育对于延迟青年的性行为并没有效果。这些发现均表明性教育课程的内容非常关键。米勒等人(Mueller et al., 2008)的一项研究发现,合适、全面的性教育课程有助于推迟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而且性教育能有效增进那些易传染性传播疾病的脆弱群体的福祉。针对英国青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那些从学校获得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群体比从其他渠道(比如网络等)获得相应知识的群体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更小(Wellings et al., 1995)。以前的一些针对中国青年的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青年在

避免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这一点上非常糟糕,其风险性行为的发生正是源于严重缺乏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尤其是避孕与免于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安全保护行为的相关知识(Wang & Davidson, 2006; Wang et al. 2005)。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农村家庭的青年比那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和城市青年在性教育这方面的知识更缺乏,因而更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因此,是否接受过适宜的性教育是对青年发生首次及安全性行为测量的一个有效变量(WHO, 2005)。

三、研究假设、数据、变量设置统计方法

(一)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本文提出,青年早期性行为的发生是他/她们对自己的越轨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代价进行权衡之后的一种主动的、理性的行动。根据既有研究显示的青年性知识获取对于其性行为发生的影响的相关结论认识,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设如下:

对于女性婚前性行为的较高社会排斥度使得女性较早开始性行为面临更大的社会代价,因此未婚男青年比未婚女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发生时间早。

相比于农村地区、欠发达的中部或西部地区,城市和发达的东部地区是社会变革首先发生和持续发展的地方,这些地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青年较早发生首次性行为带来的“社会声誉”受损以及造成社会代价较小,从而生活在城市以及东部发达地区成为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的风险因素。

亲生父母双全家庭的未婚青年较早发生性行为会在家庭中受到的责怪较大,而且相比亲生父母非健全家庭的孩子,他们较早发生性行为对家庭声誉的损害也相对较大,因而他们较早发生性行为的社会代价也较大。因此,亲生父母双全家庭成为延迟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

非独生子女家庭通过兄弟姐妹间关于性知识的交流、父母较高教育程度通过代际文化资本传递的作用、个人较高教育程度通过文化资本的作用增加了中国未婚青年关于性行为的知识,从而成为延迟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资料来自一项全国青年生殖健康调查的抽样数据。该调查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及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在2009年10月至11月开展的“第一次全国青年生殖健康调查”。该调查的总体为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①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未婚青年。虽然上述群体年龄跨度较小,但他们在生活状态上具有多样性。因此调查对象被细分成三类子总体:(1)学校青年群体,即调查期间正在校读书的青年群体,不区分住校还是走读。从年龄上看,涉及初中阶段到研究生阶段的青年;(2)家庭户工作/待业青年群体,即在家居住、有工作或者目前正在待业的青年群体(根据属地原则,调查时不区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3)集体户工作青年群体,即具有集体居住性质且有工作的青年群体。“第一次全国青年生殖健康调查”采用分层和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相结合的四阶段混合抽样方法,最终涉及全国40个县(市、区)的学校、家庭户和集体户。^②

调查利用了结构化问卷进行面访。为了获得高质量数据,针对被访青年,访员们采用了营造独立环境、匿名、敏感问题自填、投票箱回收问卷等多种方式。全国共发放问卷22535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2288份,有效问卷率为98.9%。我们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此次调查数据结果进行了加权。经推断,2009年全国共有15-24岁未婚青年164719905人,其中,男性青年50.8%,年龄均值19.2岁。

(三)变量设置

用于分析的响应变量是“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其构建源于调查问卷中的历史回顾性问题:“首次性行为发生时,你多少岁?”,具体处理方法在统计方法部分进行阐释。考虑到回归模型的数据要求,我们结合各变量的频度分布并按分析所需,在定义好适合的每个变量的参照组后,将其再编码生成为虚拟变量,具体编码过程及相应结果如表1所示。

① 从可操作性角度考虑,西藏自治区未列入本次调查范围。

② 若有读者对本调查的详细抽样方案感兴趣,可以联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表 1 用于本研究分析的解釋变量编码过程

解釋变量	定义/编码
影响社会代价的变量	
性别	虚拟变量(1 = 男性,0 = 女性)
城乡	虚拟变量(1 = 城市,0 = 农村)
区域	
东部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中部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西部	参照组
家庭结构	
亲生父母双全	虚拟变量(1 = 亲生父母双全,0 = 其他情况)
是否在校生	
在校生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影响性知识获取的变量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学历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高中/中专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初中及以下	参照组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学历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高中/中专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初中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小学及以下	参照组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学历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高中/中专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初中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小学及以下	参照组
接受过学校性教育培训	虚拟变量(1 = 是,0 = 否)

(四) 统计方法

在研究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时,我们可以运用人口学中假想队列的思想。据回顾性资料,即调查中“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项的频度表输出结果可知,最早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受访者年龄是12岁,而调查对象是15-24岁组的青年人。若受访青年回答了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那么生存时间(即保持处子之身的时间)为其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减去12岁,这是完全数据;若受访青年在调查时并未发生其首次性行为,我们不能据此删除该样本,因为受访时年龄减去12岁的数据信息虽不完全但仍然可用。本研究中,有4992例完全数据,同时也有17296例右删失数据。

在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中,关于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的回顾性数据是以年为单位,即时间只刻画到了受访者是“多少岁”发生首次性行为,而不能捕捉到更详细的时间(比如“月”),因此使用生命表(life table technique)技术体系中的乘积一极限法(又称为Kaplan-Meier法)来捕捉受访青年个体从假定的观测起始时间(为12岁)到数据收集结束时间(24岁)的事件史资料。对于本研究中的寿命资料,我们分别以性别、城乡和区域作为分类变量来估计生存函数。并使用对数秩检验(log-rank test)来探究各组生存曲线之间是否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如平常的回归分析一样,我们分析有关协变量是否对生存时间有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具体使用的是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来对全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我们所使用的调查数据运用了复杂抽样设计方法,我们运行了考虑抽样设计效应(design effect)的模型。^①

COX风险模型中 $h_0(t)$ 表示基准风险函数,则第 i 个被观测个体的危险是:

$$h_i(t) = h_0(t) \exp(\beta_1 x_{i1} + \beta_2 x_{i2} + \cdots + \beta_m x_{im}) \quad (1)$$

上式中 $h_i(t)$ 为第 i 名受访青年保持处子之身到 t_i 时刻的危险率函数, $h_0(t)$ 是当所有危险因素(即 $x_{ij} = 0$)不存在时的基础危险率函数, $X = (x_{i1}, x_{i2}, \cdots, x_{im})$ 是可能与生存时间有关的 m 个危险因素所构成的向量。将上式变形如下:

① 1965年,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莱斯利·基什(Leslie Kish)在由纽约Wiley出版社出版的《抽样调查》(Survey Sampling)一书中首次引进设计效应的概念。

$$\ln \left[\frac{h_i(t)}{h_0(t)} \right] = \beta_1 x_{i1} + \beta_2 x_{i2} + \dots + \beta_m x_{im} \quad (2)$$

此式表明:各危险因素与回归系数的线性组合就是第*i*名受访青年的相对危险率函数的自然对数值。再设有*i*和*j*两个受访青年,其危险因素向量分别为*X*₁与*X*₂,由此进一步得出他们的相对危险率的自然对数为:

$$\ln \left[\frac{h_i(t)}{h_j(t)} \right] = \beta_1 (x_{i1} - x_{j1}) + \beta_2 (x_{i2} - x_{j2}) + \dots + \beta_m (x_{im} - x_{jm}) \quad (3)$$

即利用“具有某预后因素向量的受访青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与不具有该预后因素向量的受访青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在所有时间上都保持一个恒定比例”的假设,获得了各时间点上两个受访青年相对危险率函数的估计值。上述各式中的回归系数需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一旦有了危险率函数的估计值,再利用生存时间函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获得了其他生存时间函数的估计值。如公式(3)所示,若 $\beta_i > 0$,表示该协变量是危险因素,其值越大使青年保持处子之身的时间越短;若 $\beta_i < 0$,表示该协变量是保护因素,其值越大使青年保持处子之身的时间越长。为了将参数估计表示成风险率(hazard ratios),即风险函数的比率,我们使用系数的反对数值,即使用*EXP*(β)来描述预测变化一个单位对风险的影响。

四、结果分析

(一)事件史建模的非参数描述

图1至图2描述了12-24岁中国未婚青年的生存函数。这些生存曲线图分别从性别、城乡和区域视角刻画了每个年龄对应的生存函数KM估计值,即,在对应的年龄未婚青年“未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比例”情况。同时,在应用乘积一极限法对各组进行比较时,使用了Log-rank检验,结果发现所有这些组别之间(性别、城乡及区域之间)的差异统计显著($P < 0.001$)。

图1描述了12岁到24岁中国男女未婚青年在每个年龄对应的生存函数KM估计值,以及未婚男女青年生存函数KM估计值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14岁时,基本上100%的男性和女性都报告还保持处子之身。在17岁之前,只有约7%的男性和4%的女性报告其发生了首次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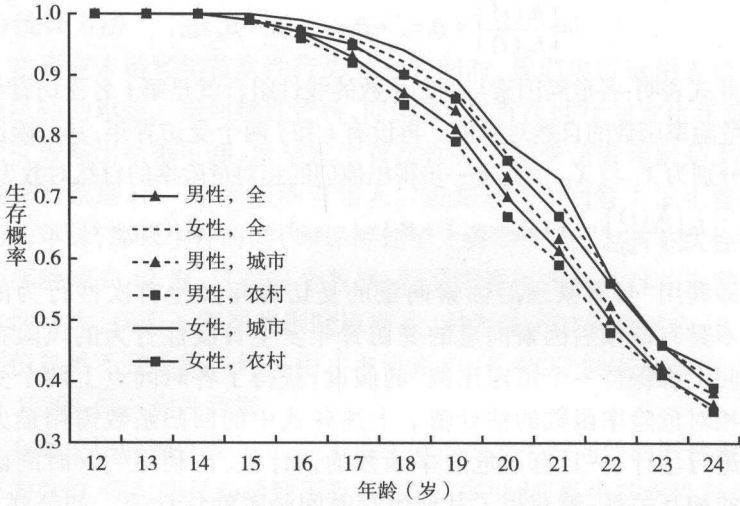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按性别、城乡报告的生存函数

为。20岁开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报告其性行为开始明显增加。可以发现,在21岁到22岁之间,女性和男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报告比例的性别差异最大(30% vs. 39%);之后,这一差异开始变小,在23岁时,约54%的女性和59%的男性报告发生了性行为。在16岁到23岁之间,相比于城市男性,更高比例的农村男性报告开始了他们的性行为,而这一模式在女性中也大致相仿。从15岁开始,直到23岁,相对于城市女性而言,农村女性报告发生首次性行为比例更高。

图2描述了12岁到24岁未婚男女青年生存函数KM估计值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报告17岁之后首次性行为发生的细微区域差异开始出现。总体上说,17岁到24岁之间的生存率在西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最高。在三大区域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差异最为明显,而中部的生存曲线基本落在二者之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西部地区的青年比东部地区的青年报告约早一年开始首次性行为。在三大地区中,从17岁开始,相对于女性,男性报告的生存(保持处子之身)的比例都较低。从20岁开始,东部与中部之间的差异都比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小一些。在20岁时,女性报告的生存函数估计值东部和中部的差异是4%,中部和西部的差异是5%,而西部和东部的差异则为9%。这一差异在男性中则分别为5%、6%和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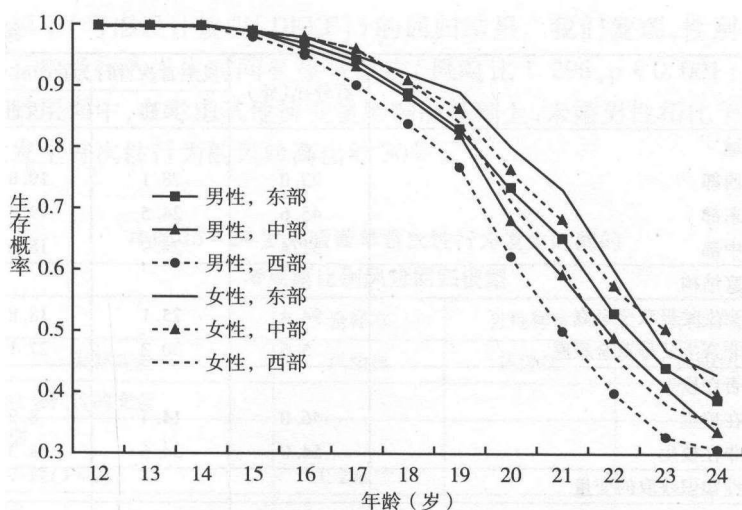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按性别、区域报告的生存函数

(二)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

表2所示为样本特征及被纳入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在全样本运行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会分别针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运行模型,以考察其性别差异特征。表2中百分比为加权后百分比,样本数则未经过加权处理。

表2 样本描述及用于COX模型的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

	百分比(%)	发生首次性行为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受访时年龄			
青少年中期(middle adolescence)15-16岁	17.7	5.0	2.8
青少年后期(late adolescence)17-20岁	49.1	17.4	12.9
成年早期(early adulthood)21-24岁	33.2	46.1	39.3
影响社会代价的变量			
性别			
男性	50.8	25.5	—
女性	49.2	—	19.2
城乡			
农村	51.5	25.7	20.2
城市	48.5	25.1	18.2

续表 2

	百分比(%)	发生首次性行为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区域			
西部	23.0	28.1	19.8
东部	45.6	24.5	19.3
中部	31.4	24.9	18.6
家庭结构			
亲生父母双全家庭	94.4	25.1	18.8
非亲生父母双全家庭	5.6	30.2	27.1
是否在校生			
在校生	46.0	14.4	8.9
非在校生	54.0	34.6	28.3
影响性知识获取的变量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45.3	12.5	8.4
非独生子女	54.7	13.1	10.7
受访人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8.3	27.0	19.8
高中 a	56.4	20.9	16.6
大专及以上学历	25.3	34.6	24.4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4.2	29.2	21.9
初中	37.4	24.7	19.0
高中 a	32.6	25.7	18.2
大专及以上学历	15.8	23.3	19.3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5.5	25.3	21.2
初中	38.0	26.4	18.9
高中 a	24.8	24.9	18.2
大专及以上学历	11.7	23.8	17.8
在校时是否学过性教育课程			
接受过	34.8	26.7	19.9
未接受过	65.2	24.8	18.8
样本数	22288	11212	11076

注:(1)高中包括中专教育程度;表3中的受访人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中的“高中”含义与此相同。(2)a为参照组。

表3是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风险因素的考克斯比例

风险模型(考虑设计效应[DEEF])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性别对于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有显著效应(风险比 1.296, $p < 0.001$)。每个年龄层面中,在考虑其他协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未婚男性相比于未婚女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高出约 30%。

表 3 中国 15-24 岁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的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

	全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解释变量	风险比	风险比	风险比
影响社会代价的变量			
性别			
男性(1 = 是)	1.296 ***		
城乡			
城市(1 = 是)	.817 **	.840 *	.791 **
区域			
西部 a			
东部	.674 *	.655 *	.697
中部	.769	.755	.785
家庭结构			
亲生父母双全家庭(1 = 是)	.702 **	.705 **	.704 **
是否在校			
在校(1 = 是)	1.033	1.107	.944
影响性知识获取的变量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1 = 是)	1.298 ***	1.293 ***	1.310 ***
受访人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a			
高中	1.047	1.036	1.065
大专及以上	.646 ***	.686 ***	.596 ***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a			
初中	.723 *	.717 *	.724 *
高中	.688 *	.668 *	.710
大专及以上	.805	.748	.876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a			

续表 3

	全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初中	1. 103	1. 171	1. 016
高中	1. 234	1. 340 *	1. 103
大专及以上	1. 216	1. 337	1. 062
在校时是否学过性教育课程 (1 = 是)	1. 057	1. 083	1. 025
观察项	22288	11212	11076
失效事件	4982	2868	2114
风险时间	170498	85951	84547
Wald 卡方检验	179. 45 ***	78. 99 ***	149. 70 ***
自由度	16	15	15
对数似然值	-44652. 59	-23944. 46	-17298. 45

注:(1)所有变量编码成为哑变量,1表示“是”,0表示“否”。(2)a为参照组。(3)在Stata的处理过程中,考虑稳健标准误(Robust SEs)。(4)***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首先解释在全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均显著的解释变量结果。来自亲生父母双全家庭的青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青年,相比于来自其他类型家庭(比如单亲、继父母家庭等)的青年在每个年龄层级经历其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低约30%。这些发现与此前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即亲生父母双全家庭对于青年推迟首次性行为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保护因素(Newcomer & Udry, 1987)。

模型结果显示,身为“独生子女”的青年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的青年,在每个年龄层级经历其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高约30%。相应地,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这个高出的风险的数值分别约为30%和31%。这个发现与西方的一些研究结果是可比的,如威德默(Widmer, 1997)也曾发现,家庭中“有兄长”对于青年的性行为发生时间有显著影响。

在城乡视角下,模型结果显示,相比农村青年,城市青年在每个年龄层级经历其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低约18%。相应地,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这个风险的数值分别低约16%和21%。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研究预期有差异,但是与前面的双变量分析相一致,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市青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较低。但我们原本预期城市青年发生首次性行为时间较早,因为这些青年生活的城市是“性革命”发生

的主要地方,可是我们的回归结果却与研究预期结果相反。

从“教育程度”这个层面来看,模型结果显示,“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的青年相比于“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在每个年龄层级经历其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低约 35%。相应地,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这个风险的数值分别低约 31% 和 40%。这些发现与西方的研究发现一致。受教育程度高的青年在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储备方面会比教育程度低的青年丰富;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青年一般有较强的事业抱负,他们的时间更多花在了对学业、事业的追求上,而如果他们在较早年龄开始首次性行为,其付出的社会代价会较大。另外,学历较低的青年会在较早的年龄踏入工作岗位,脱离学校的教育与管束,因而更容易发生婚前性行为(Guo et al., 2012)。

其次,在性别之间有差异的解释变量有三个:区域变量、父亲受教育程度变量及母亲受教育程度变量。区域变量对于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的效应较弱。相比于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青年,那些生活在中国东部地区的青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低约 33%。相比于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男性青年,那些生活在中国东部地区的男性青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低大约 36%。而区域变量在女性样本的回归中则不显著。中部和西部之间的比较结果也都不显著。这里的发现实际上否定了我们之前对于东部地区发生风险更高的研究假定。当然,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讲,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城市的男性青年有着相对于农村青年、东部青年有着相对于西部青年较好的学业、事业机会资源,因此他们较早开始性行为的机会成本较高。

至于父母教育程度变量,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以父母教育程度衡量的父母资源是否会影响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结果并不与研究预期完全一致。如前所述,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父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青年首次性行为的推迟有正向关系,我们的数据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父母教育程度对于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的效应与预期是一致的。从数据来看,相对于其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男性而言,那些其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高中的青年男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较低。具体来说,其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中国男性青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比其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的男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低约 28%,对于其父亲受教育程度是高中的中国青年而言,这一风险则进一步降低到 33%。有意思的是,其父亲受教育

程度是大专或以上的中国男性青年与其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的男性青年之间却没有显著不同,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发现。再看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模型结果似乎有悖于我们的常识:那些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男性青年开始首次性行为的危险相比于其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的男性青年开始首次性行为的危险要高出大约34%。但对于女性而言,其父母受教育程度基本没有显著作用,只有一个例外,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女性青年开始首次性行为的危险比其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的女性青年开始首次性行为的危险要低约28%。这里的发现需要在未来有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解析。

我们还发现,接受正规的性教育课程对于无论男女青年的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都没有显著效应。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的课堂性教育内容非常局限,除却简单的生理知识介绍,很少涉及性健康、避孕或自我保护性行为这些话题,甚至也很少涵盖关于艾滋病和性病传播等相关的话题(Wang & Davidson, 2006; Wang et al., 2005)。换言之,中国的学校性教育课程并没有提供给学生与性行为相关的必要和有用的知识及信息。

五、结论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约22岁。纵向比较来看,相比于前几代人,当下中国青年(我们的调查对象可看作1985-1994年出生队列)首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已经提前:基于1999-2000年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数据(CHFLS)的研究显示,1960-1969年出生队列的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约25岁,1970-1979年出生队列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约23岁(Parish et al., 2007),考虑到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的调查数据未包括已婚青年人,从而可能高估了当下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因此与上述两个队列数据的实际差异会更大。

基于本研究中分类描述的生存曲线结果,我们发现,虽然在各个层级的青年中18岁以前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比例较小,但这可能代表了一种“非正常状态的(off-time)”性行为转变模式(Guo et al., 2012)。也就是说,这部分发生性行为的低龄青年群体正是潜在的最脆弱并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在未来需要专门针对这类在较早开始首次性行为的群

体进行行为模式及行为决定因素的深度探究。我们的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前文所述的社会代价理论视野下的假定,即未婚青年早期性行为的发生是他们进行权衡之后的一种主动的、理性的行动。

无论是在城乡还是区域层面,相比于男性青年,女性青年均倾向于在较晚年龄发生首次性行为。这一发现与我们的研究预期,以及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婚前性行为对女性社会代价高昂这一理论设定相吻合。此前的文献研究显示,中国的“性革命”通常是以男性主导为特征,社会文化氛围对于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非常有限(Pan, 2006)。实际上基本是消极否定的态度,女性青年若发生婚前性行为势必会影响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前景。虽然这种风气一定程度上也在改变(尤其是对于“处女婚姻”期待的改变),但婚前性行为还是有限地发生在已处于恋爱关系并确定会走向婚姻的人群中(Wang & Davidson, 2006)。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农村青年相比城市青年、西部地区青年相比东部地区青年在各个年龄段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都更高。这个计量结果与我们的研究预期相反,我们原本预期,相比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东部地区是社会变革首先发生和持续发展的地方,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城市、东部地区青年较早发生首次性行为带来的“社会声誉”损害较小,付出的社会代价较小,故而他们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更高。但这里得到一个相反的发现,可能的解释是,虽然婚前性行为在广大农村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貌似是一个禁忌,但是中国农村民间风俗对此却另有解释。而且,相比城市、相比发达的东部地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的青年订婚年龄较早,在这些将要走向婚姻的订婚青年伴侣之间的婚前性行为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接受,甚至变得平常起来(Wang & Davidson, 2006)。

而对于影响社会代价层级变量中的家庭结构,其计量结果完全印证了我们基于“社会声誉”——“社会代价”理论链条下的研究预期,即相比亲生父母非健全家庭的青年,亲生父母双全家庭的未婚青年(无论男孩或是女孩)较早发生性行为对家庭声誉的损害更大,因而他们较早发生性行为的社会代价也就更大。故亲生父母双全家庭青年在各个年龄段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都较低。

我们的回归结果也呈现了中国未婚青年性知识获取匮乏的现实:多种传递正确性知识的道路或被其他政策影响(如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独生子女”现象),或被传统文化所影响(如亲子间交流性相关话题

的家庭缺位),或被教育缺位所影响(如综合的性教育课程的欠缺)。

首先,我们发现,“独生子女”男女青年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的男女青年在各个年龄段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都更高。可见,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与其相近年龄的同伴关于性知识的交流对其行为的影响是何等重要。这里的研究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的深层意义,即它在中国当下及未来持续的计划生育政策语境下所体现出来的意义:除了在制定性与生殖健康干预政策方面考虑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这两个群体的组间差异外,还是否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所“反思”呢?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独生子女”这样一个“特殊”风险群体的存在与发展。^①而对于处在持续低生育水平时期的当今中国,我们的政府是否应该考虑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让未来的孩子们能够生活在一个从小有兄弟姐妹相伴的更为健康的成长环境?这需要更多的行为科学视角下的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来做扎实支撑。

其次,在影响性知识获取的层级变量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计量发现却难于理解。总体上看,父母的教育程度大部分都没有按我们预期的方向去发生作用。比如,我们的研究假定是青年们首次性行为发生的风险随着其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小。如前面讨论中所言,我们这个研究假定是基于西方的诸多实证研究结果,以及“代际文化资本”传递的作用所造成的来自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的青年对性知识掌握的差异。西方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于青年性行为发生有保护性效应,也即可推迟首次性行为的发生。然而,我们的结果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女性青年而言作用非常有限。对男性青年而言,虽然父亲受教育程度对男性青年有保护性效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则有着相反的效应。对于这些与研究预期和前期文献不一致的发现,我们在此处还不能提供实证性的解释。总之,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具有反常影响机制,希望在将来能有专门的研究来对这个意外的发现加以深层解释。

最后,结合青年教育程度对其首次性行为发生的保护性作用、性教育课程获取对于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缺乏显著性作用,以及亲子间交流性相关话题与青年性行为推迟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认为国家在

^① 有研究从社会化的内容着手,发现“独生子女”的世故性、敏感性和实验性低于“非独生子女”,恃强性、兴奋性、敢为性高于“非独生子女”(郝玉章、风笑天,1997,1998)。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及干预政策制定方面,应将青年们的父母作为强有力的资源。政府及相关机构在设计相关政策干预项目时,应针对性别、年龄等影响因素,针对性地加强对父母的教育培训,注重提高父母的交流技巧及转变观念,减少其与子女交流时的尴尬情绪,并应努力培养和谐健康的亲子关系,营造亲子间交流的良好家庭氛围(左霞云等,2007;涂晓雯等,2008)。同时,应在学校中加强性教育课程,毕竟学校是青少年系统接受科学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最重要的场所。政府和相关机构必须坚持从中学阶段起给学生以综合的性教育课程,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革新课程内容,从传统单一的禁欲教育模式走出来,关注综合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传播。

参考文献:

- 郝玉章、风笑天,1997,《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现状——对湖北省五市镇 593 名中学生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第 8 期。
- ,1998,《浅论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人口学刊》第 1 期。
- 考克汉姆,2011,《医学社会学》,高永平、杨瀚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涂晓雯、金峰、左霞云、楼超华、高尔生,2008,《干预对中学生父母家庭性教育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生殖与避孕》第 11 期。
- 休厄尔,2012,《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左霞云、涂晓雯、楼超华、高尔生,2007,《中学生与父母性知识沟通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公共卫生》第 2 期。
- Abma, J. C. & F. L. Sonenstein 2001, "Sexual Activity and Contraceptive Practices among Teenag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8 and 1995."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Series 23* (21).
- Antonella, P., R. Filomena & R. Rosella 2007, *Genders in the Life Course; Demographic Issues*. Berlin: Springer.
- Becker, G. S. 1975,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Rates of Return."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2nd Edition). Boston: NBER.
-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G. S. & N. Tomes 1986,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 3(1).
- Billy, J. O. & J. R. Udry 1985, "The Influence of Male and Female Best Friends on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Adolescence* 20(77).
- Bingham, C. R., B. C. Miller & G. R. Adams 1990, "Correlates of Age at First Sexual Intercourse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Young Women."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5(1).
- Bozon, M. & O. Kontula 1997, "Initiation Sexuelle et Genre: Comparaison des Évolutions de Douze Pays Européens." *Population (French Edition)* 52(6).
- Brewster, K. L. 1994, "Race Differences in Sexual Activity among Adolescent Women: The Role of

-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3).
- Brewster, K. L. & W. R. Grady 1993, "Social Context and Adolescent Behavior: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on the Transition to Sexual Activity." *Social Forces* 71(3).
- Caron, S. L. & E. G. Moskey 2002, "Changes over Time in Teenage Sexual Relationships: Comparing the High School Class of 1950, 1975, and 2000." *Adolescence* 37(147).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Cornell, D. G. 1990, "Prior Adjustment of Violent Juvenile Offender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4(6).
- Crockett, L. J., C. R. Bingham, J. S. Chopak & J. R. Vicary 1996, "Timing of First Sexual Intercourse: The Role of Social Control, Social Learning, and Problem Behavior."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5(1).
- Degaston, J. F., S. Weed & L. Jensen 1996, "Understand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Sexuality." *Adolescence* 31(121).
- East, P. L. 1996, "The Younger Sisters of Childbearing Adolescents: Their Attitudes,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s." *Child Development* 67(2).
- Fornäs, J. & G. Bolin 1995, *Youth Culture in Late Modernity*.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 Furstenberg, F. F., S. P. Morgan, K. A. Moore & J. L. Peterson 1987, "Race Differences in the Timing of Adolescent Intercour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
- Gagnon, J. H. 1975, "Sex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2).
- Goldthorpe, J. H. 1998, "Rational Action Theory for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9(2).
——— 2007, *On Sociology* (2nd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o, W., Z. Wu, Y. Qiu, G. Chen & X. Y. Zheng 2012, "The Timing of Sexual Debut among Chinese You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A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3 - 5.
- Hawes, Z. C., K. Wellings & J. Stephenson 2010, "First Heterosexual Intercour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7(2-3).
- Hendriksen, E. S. 2008, "Start Safe, Stay Safe: Condom Use at Sexual Debut, Condom Use Consistency, and Longitudinal Markers of Sexual Risk."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Hogan, D. P. & E. M. Kitagawa 1985, "The Impact of Social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on the Fertility of Black Adolesc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4).
- Johnson, K. A. & K. A. Tyler 2007, "Adolescent Sexual Onset: An Intergenera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6(7).
- Juarez, F. & T. C. Martin 2006, "Safe Sex Versus Safe Love? Relationship Context and Condom Use Among Male Adolescents in the Favelas of Recife, Brazil."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5(1).
- Kahn, J. R. & K. E. Anderson 1992, "Intergenerational Patterns of Teenage Fertility." *Demography* 29(1).
- Kohler, P. K., L. E. Manhart & W. E. Lafferty 2008, "Abstinence-Only and 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 and the Initiation of Sexual Activity and Teen Pregnancy."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2(4).

- Kowal, A. K. & L. Blinn-Pike 2004, "Sibling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Attitudes toward Safe Sex Practices." *Family Relations* 53(4).
- Lauritsen, J. L. 1994, "Explaining Ra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Social Forces* 72(3).
- Lauszus, F. F., J. L. Nielsen, J. Boelskifte & J. Falk 2012, "Sexual Practice Associated with Knowledge in Adolescents in Ninth Grade." *Danish Medical Journal* 59(7).
- Levin, M. L., X. Xu & J. P. Bartkowski 2002, "Seasonality of Sexual Debu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4).
- Lohman, B. J. & A. Billings 2008, "Protective an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Boys' Early Sexual Debut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7(6).
- Luker, K. 1997, *Dubious Conceptions: The Politics of Teenage Pregnan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Lanahan, S. & L. Casper 1995,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F. Reynolds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 Meschke, L. L., J. M. Zweig, B. L. Barber & J. S. Eccles 2000, "Demographic,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Predictors of the Timing of First Intercours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0(3).
- Miller, B. C., M. C. Norton, T. Curtis, E. J. Hill, P. Schvaneveldt & M. H. Young 1997, "The Timing of Sexual Intercourse among Adolescents Family, Peer, and Other Antecedents." *Youth and Society* 29(1).
- Moore, S. & D. Rosenthal 1992, "The Social Context of Adolescent Sexuality: Safe Sex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5(4).
- Mueller, T. E., L. E. Gavin & A. Kulkemi 2008,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x Education and Youth's Engagement in Sexual Intercourse, Age at First Intercourse, and Birth Control Use at First Sex."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2(1).
- Nathanson, C. A. 1991, *Dangerous Passage: The Social Control of Sexuality in Women's Adolesce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Neugarten, B. L., J. W. Moore & J. C. Lowe 1965, "Age Norms, Age Constraints, and 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6).
- Newcomer, S. & J. R. Udry 1987,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Effects on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9(2).
- Pan, S. 2006,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imary Life Cycle: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ina's Sexual Revolution." In E. Jeffreys (ed.),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Parish, W. L., E. O. Laumann & S. A. Mojola 2007, "Sexual Behavior in China: Trends and Comparis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44).
- Resnick, M. D. & R. W. Blum 1994, "The Association of Consensual Sexual Intercourse during Childhood with Adolescent Health Risk and Behaviors." *Pediatrics* 94(6),.
- Rodgers, K. B. 1999, "Parenting Processes Related to Sexual Risk-Taking Behaviors of Adolescent Males and Fema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1).

- Santelli, J. S. , L. D. Lindberg, J. Abma, C. S. McNeely & M. Resnick 2000,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Estimates and Trends from Four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32(4).
- Singh, S. , D. Wulf, R. Samara & Y. P. Cuca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iming of First Intercourse: Data from 14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6(1).
- Song, Y. & C. -Y. Ji 2010, "Sexual Intercourse and High-risk Sexual Behaviours among a National Sample of Urban Adolesc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2(3).
- Swidler, Ann 1984,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 Teachman, J. D. , K. Paasch & K. Carver 1996, "Social Capital and Dropping Out of School Ear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8(3).
- Thomson, E. S. McLanahan & R. B. Curtin 1992, "Family Structure, Gender, and Parent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4(2).
- Upchurch, D. M. , C. S. Aneshensel, C. A. Sucoff & L. Levy-Storms 1999, "Neighborhood and Family Contexts of Adolescent Sexual Activ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4).
- Wang, B. & P. Davidson 2006, "Sex, Lies, and Videos in Rural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of Women's Sexual Debut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3(3).
- Wang, B. , S. Hertog, A. Meier, C. Lou & E. Gao 2005, "The Potential of 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 in China: Findings from Suburba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31(2).
- Wellings, K. , J. Wadsworth, A. Johnson, J. Field, L. Whitaker & B. Field 1995, "Provision of Sex Education and Early Sexual Experience: The Relation Examined." *BM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1(7002).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2005,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of Adolescents and Youths in Laos: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Projects, 1994 - 200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idmer, E. D. 1997, "Influence of Older Siblings on Initiation of Sexual Intercours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9(4).
- Wu, L. L. & B. C. Martinson 1993,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Risk of a Premarital Bir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2).
- Xu, A. , J. Zhang & Y. R. Xia 2008, "Impacts of Parents' Divorce on Chinese Children: A Model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as a Mediator."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42(3).
- Zabin, L. S. & S. C. Hayward 1992,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and Childbearing* (Vol. 26).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 Zha, B. & W. Geng 1992, "Sex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8(1).
- Zhou, X. 1989, "Virginity and Premarital Sex in Contemporary China." *Feminist Studies* 15(2).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郭未)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和
人口科学合作中心(郑晓瑛)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社会学系(吴正)
责任编辑: 杨 可

likely to divorce. The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are consistent with studies conducte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suggest that childre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marriage and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in marriage. The authors also fi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hildren on marital sta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gender are stronger in rural areas, which is probabl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valu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ll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change of marriage values and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rat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increase of divorce rates in recent years.

One-Child Policy and Elderly Migration *Wu Yaowu* 49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7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acted the one-child policy, which was strictly implemented in urban areas. Now, those children born under this policy begin to join the labor market, while their parents are retiring. In China's well-developed urban labor market, it's quite normal for the one-child generation, who has received good education with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o search for jobs in other cities, especially in the big ones. However, China's elderly care model largely remains unchanged, so parents intend to move to destination cities with their children, which illustrates a unique phenomenon of elderly migration in China: moving to big cities. This leads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nd raises challenges to public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o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alysis of Timing and Risk Factors of Sexual Debut among Chinese Unmarried Youth: A social cost perspective
..... *Guo Wei, Zheng Xiaoying & Wu Zheng* 74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National Youth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in 2009, which examines the sexual behavior of over 22,000 unmarried youth aged 15 – 24 from mainland China, we use Kaplan-Meier method to estimate the gender-specific survival distribution of sexual debut across urban/rural status and regions. We also use Cox regression models to estimate the risk difference of the timing of sexual debut among Chinese youth in terms of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youth's social cost and sex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gender, urban/rur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timing of sexual debut and the age-related prevalence of sexual experi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cial cost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community setting, and family structure,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timing of sexual debut among Chinese youth; while onl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youth's sex knowledge acquisition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timing of sexual debut.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strategies to prevent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mong Chinese youth need to consider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iming of sexual de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cost and need to target at-risk groups, who have the least amount of knowledge about thei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The Documentary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ment: A case study of county government *Li Linzhuo* 101

Abstract: While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ly examine official documents (wenjian) produc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ounty-level doc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itimacy” and “efficiency”, the author analyzes how county-level official documents are produced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documents from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Taking the local Public Health Bureau as a case,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ocuments issued in a given year: one is pragmatic efficiency-oriented, and the other is symbolic legitimacy-oriented. These two types of documents show different features in sequenc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finds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higher-level documents on documents produc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county government is more active and more independent of upper instructions in “economic area” than in “social area”. Finally, whil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unty government and higher governm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 the real impact of higher governments on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documents has declined.

City Governmental Structur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 *Guan Bing* 129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varies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How to explain the regional variation?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meowners’ associations in three major cities as examples, the author trie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Study shows that homeowners’ associations in the three cities have followed different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op-down government-driven model, bottom-up association-driven model, and a mixed model with multi-actor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of the three cities turn out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ccounting for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these associations. The multi-leve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with a higher government upo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provides a more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s than the single-leve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with the local